

赵臣, 陈扬乐, 张凯, 等. 三亚市季节性旅游移民社会融合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J]. 地理科学, 2020, 40(12): 2064-2072. [Zhao Chen, Chen Yangle, Zhang Kai et al. Social integration on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seasonal tourism immigrants in Sanya.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20, 40(12): 2064-2072.] doi: 10.13249/j.cnki.sgs.2020.12.013

# 三亚市季节性旅游移民社会融合对 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赵臣<sup>1,2</sup>, 陈扬乐<sup>1</sup>, 张凯<sup>1</sup>, 申文灿<sup>3</sup>

(1. 海南大学旅游学院, 海南 海口 570228; 2. 安庆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安徽 安庆 246133;

3. 四川大学旅游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4)

**摘要:** 以旅游消费移民的代表性群体——季节性旅游移民为对象, 构建季节性旅游移民社会融合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概念模型, 并提出相关假设; 以典型的旅居城市三亚为案例地, 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假设进行验证。研究表明: 季节性旅游移民的文化融合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较小, 仅对正面情绪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而心理融合和身份融合均正向显著作用于主观幸福感的生活满意和正面情绪 2 个维度, 且对负面情绪有显著抑制作用。基于实证分析, 从文化融合、身份融合、心理融合等层面提出季节性旅游移民主观幸福感的提升策略。

**关键词:** 季节性旅游移民; 社会融合; 主观幸福感; 海南三亚

**中图分类号:** K90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690(2020)12-2064-09

旅游大众化背景下,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 季节性迁移这一生活方式已然成为人们满足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途径。海南省凭借温暖的气候和优良的空气质量, 已成为中国季节性旅游移民聚集的代表地区之一。2015—2018 年海南省常住型候鸟人口(连续居住时间半年以上)分别为 48.32 万人、49.58 万人、51.41 万人、49.62 万人, 流动型候鸟人口(连续居住时间不满半年)分别为 66.68 万人、71.84 万人、79.57 万人、82.61 万人<sup>[1]</sup>。大规模季节性旅游移民的涌入, 不仅推动了流入地社会经济发展, 也对流入地社会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如何实现季节性旅游移民在流入地的社会融合, 是当地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得不重视的问题。此外, 季节性旅游移民的社会融合不仅关系到流入地社会发展质量, 也关系到个体在流入地的生活状态。主观幸福感作为衡量个体生活

质量的重要指标, 在空间流动和文化差异的阻碍下, 季节性旅游移民社会融合如何影响其主观幸福感? 此类问题在以往的研究中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

国外旅游移民的研究已形成较成熟的研究体系, 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迁移的空间格局<sup>[2]</sup>、迁移动机<sup>[3]</sup>、社会影响<sup>[4]</sup>、社会资本<sup>[5]</sup>等方面。以旅游度假、退休养老、避暑过冬、居住生活方式体验等为目的、消费导向的季节性移民<sup>[6]</sup>, 是国外旅游移民研究的焦点之一。Smith 等将季节性旅游移民在流入地居住的时间可操作化地定义为离开常住地一个月以上且不超过 1 a, 本文亦遵循这一对季节性旅游移民居住时间的界定<sup>[7]</sup>。国内有关旅游移民的研究内容多集中于旅游劳工移民的生活特征<sup>[8]</sup>、地方认同<sup>[9]</sup>以及候鸟老人的生活状况<sup>[10]</sup>、自评健康<sup>[11]</sup>等。总体来看, 国内外有关旅游移民的研

**收稿日期:** 2019-08-23; **修订日期:** 2019-12-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5GBL123)、国家社会科学重大项目(18ZDA156)、文化和旅游部 2018 年度万名旅游英才计划(WMYC20181-076)、海南省研究生创新课题(hys2018-150)资助。[Foundation: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15GBL123),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Major Project (18ZDA156), Ten Thousand Tourism Talents Program of Culture and Tourism Ministry (WMYC20181-076), Hainan Graduate Student Innovation Research Project (hys2018-150).]

**作者简介:** 赵臣(1993-), 女, 安徽安庆人, 硕士, 主要从事旅游地理研究。E-mail: 574214341@qq.com

**通讯作者:** 陈扬乐。E-mail: 335435456@qq.com

究,研究方法上以质性研究为主,国外旅游移民的研究对象集中于旅游消费移民。国内研究则对旅游劳工移民这一群体的关注较多,对季节性旅游移民探讨尚未多见。本文将研究对象界定为“季节性旅游移民”的原因在于,一是候鸟老人这一概念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其一般指 60 岁以上的群体,相对忽视了其他年龄段的季节性旅游移民;二是为了与国内外旅游移民研究对象在名称界定上保持一致,有利于旅游移民研究体系的完善。

社会融合指不同个体、群体或文化之间互相配合互相适应的过程。在研究内容上,社会融合的国内外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 3 个方面:社会融合的理论研究、社会融合的影响因素研究以及社会融合维度分析。国外学者认为社会融合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社会资本<sup>[12]</sup>、社交媒体的运用<sup>[13]</sup>、娱乐活动参与<sup>[14]</sup>等内生性因素;还包括社区类型<sup>[15]</sup>、住房类型<sup>[16]</sup>、以及交通可达性<sup>[17]</sup>等外生性因素。国内学者多立足于中国国情,以农民工、新移民、流动老人、流动儿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等为研究对象,主要从资本禀赋、居住环境、制度障碍、接纳意愿等因素研究社会融合的影响因素<sup>[18]</sup>。国内外学界有关社会融合的维度构成、维度内容、维度数量、维度名称、具体题项等尚未形成一致意见,但大部分研究都涉及经济、文化、身份和心理等方面<sup>[19]</sup>。

主观幸福感是个体依据自己内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所作的整体性评价<sup>[20]</sup>。在研究内容上,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一直备受西方学界重视。影响幸福感的因素主要包括社会支持<sup>[21]</sup>、心理健康<sup>[22]</sup>、身体健康<sup>[23]</sup>等。近年来,自然环境<sup>[24]</sup>、气候变化<sup>[25]</sup>等地理学变量也得到了学界的关注。上述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也基本上在中国的实证研究中得到了验证<sup>[26]</sup>。在幸福感的测量方法上,主要有单题测量法<sup>[26]</sup>和量表测量法<sup>[20]</sup>。前者通过被访者对某一题项的回答,来衡量主观幸福感,具有数据的可获得性和操作的便利性等优点,但容易受到随机误差影响;后者则是对 Diener 的主观幸福感量表运用较多,具有整体性和科学性。

综上,目前有关社会融合和主观幸福感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是在社会融合维度构成和主观幸福感的测量方法上仍存在一定的分歧,在对季节性旅游移民展开研究时,仍需进一步探讨。此外,尽管学术界已经开始关注季节性旅游移民在流入地的生活状况,但是对其主观幸福感还缺乏

系统考察,更缺少从社会融合的角度予以关注。鉴于此,本文以海南季节性旅游移民最具代表性的集聚地三亚市为例,通过文献回顾构建季节性旅游移民社会融合和主观幸福感两者之间的概念模型,提出相应的研究假设,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假设进行验证,揭示季节性旅游移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以期完善旅游移民研究体系,拓展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研究的广度,为营造和谐的旅游社区环境,促进旅居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

## 1 研究设计

### 1.1 量表设计与问卷收集

当研究对象为不以生产为导向的儿童<sup>[27]</sup>或流动老人<sup>[28]</sup>时,研究者一般不将经济融合纳入到社会融合中。故在设计以消费为导向的季节性旅游移民社会融合测量指标时不考虑经济融合。借鉴社会融合已有的研究成果<sup>[19,29,30]</sup>,结合季节性旅游移民的特点,考虑到自然环境因素作为季节性旅游移民的主要推拉力,选取“自然环境满意度”指标替代前人研究中的“工作环境满意度”。考虑到季节性旅游移民的周期流动性,选取“再次过冬意愿”指标替代前人研究中的“永久居留意愿”。最终经过专家征询和小组内部讨论,构建了季节性旅游移民社会融合测量指标体系,共 12 个题项:居住、自然、社会满意度 3 个心理认同层面的指标;饮食适应、交流沟通障碍、熟悉本地习俗程度 3 个文化层面的指标;社会交往意愿、社会心理距离、身份认同程度、归属感、本地居民接纳程度、再次过冬意愿 6 个社会互动与接纳层面的指标。本文的主观幸福感量表运用苗元江综合幸福问卷<sup>[31]</sup>中的主观幸福感部分,包括生活满意、正面情绪以及负面情绪 3 个维度,共 17 个测项。季节性旅游移民社会融合和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维度测项均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分别赋 1~5 分;主观幸福感的正面情绪和负面情绪测项则通过频度副词“几乎没有-很少-有时-经常-总是”从低到高赋 1~5 分,来反映被试近一周的情绪状况,其中,负面情绪维度的测项进行反向计分,即得分越高代表负面情绪出现的频率越低。

问卷调研分为 2 个阶段,第一阶段为预调研,主要目的在于通过信度检验和项目总体相关系数(CITC)分析来净化问卷,得到最终问卷。第二阶

段的正式调研于 2018 年 3 月 21 日至 4 月 1 日在三亚进行, 历时 10 d。为了提高调研的科学性与代表性, 将调研地点选择在三亚海月广场、月川桥广场等季节性旅游移民较为集中的地区。正式调研共发放问卷 380 份, 回收 355 份, 回收率 93.4%, 剔除无效样本后, 得到有效问卷 320 份, 有效率 90.1%。

## 1.2 探索性因子分析

为保证量表能够科学地反映季节性旅游移民的社会融合和主观幸福感, 对季节性旅游移民的社会融合和主观幸福感样本数据分别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首先检验样本数据是否适合因子分析。结果显示社会融合的 KMO 值为 0.780(>0.70), Bartlett 球体检验的卡方值为 2 427.462( $df=66$ ,  $sig.=0.000$ ); 主观幸福感的 KMO 值为 0.831(>0.70),

Bartlett 球体检验的卡方值为 6 524.675( $df=105$ ,  $sig.=0.000$ ), 说明有关社会融合和主观幸福感的样本数据均适合因子分析。

探索性因子分析运用主成分分析法, 采用最大方差法对因子进行旋转, 以特征值大于 1 作为选取因子的标准。旋转因子后, 题项在某一因子上负荷低于 0.5, 或交叉负荷高于 0.4 时, 则对该题项予以删除。删除后, 季节性旅游移民社会融合量表以及主观幸福感量表的探索性分析结果见表 1。社会融合量表的 12 个题项全部保留。其中  $X_1$ 、 $X_2$  以及  $X_3$  题项分别代表沟通交流、风俗习惯以及饮食适应, 属于文化融合维度。 $X_6$  和  $X_7$  题项均涉及到季节性旅游移民身份的转化与认同;  $X_4$ 、 $X_5$  和  $X_8$  则代表着季节性旅游移民与当地居民之间的交往程度和接纳程度, 季节性旅游移民身份融合程

表 1 探索性因子分析

Table 1 The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因子	特征值	题项	因子负荷	公因子方差	累计解释变异量/%
文化融合	2.665	$X_1$ 我觉得与本地居民沟通交流障碍较少	0.911	0.832	21.598
		$X_2$ 我比较适应海南的饮食	0.936	0.877	
		$X_3$ 我了解海南特有的风俗习惯	0.933	0.877	
身份融合	4.036	$X_4$ 我非常愿意与当地人进行交往	0.753	0.578	54.459
		$X_5$ 我与当地人的交往比较广泛	0.737	0.544	
		$X_6$ 我愿意把自己当做新海南人	0.817	0.669	
		$X_7$ 我感觉自己是三亚的一部分	0.830	0.694	
		$X_8$ 我感觉三亚的当地人非常愿意接纳我	0.832	0.702	
		$X_9$ 我明年还愿意来三亚过冬	0.879	0.773	
心理融合	2.204	$X_{10}$ 我对三亚的自然环境非常满意	0.902	0.818	74.205
		$X_{11}$ 我对三亚的居住环境非常满意	0.882	0.780	
		$X_{12}$ 我对三亚的社会环境非常满意	0.869	0.761	
生活满意	2.189	$Y_1$ 在三亚期间, 我的生活大多数方面与我的理想吻合	0.766	0.655	29.078
		$Y_2$ 在三亚期间, 我的生活状况良好	0.857	0.800	
		$Y_3$ 在三亚期间, 我对我的生活感到满意	0.816	0.770	
		$Y_5$ 回首在三亚的往事, 我能够感受到生活的意义和人生的圆满	0.919	0.938	
负面情绪	1.729	$Y_6$ 愤怒	0.848	0.888	54.147
		$Y_8$ 忧虑	0.917	0.938	
		$Y_{14}$ 悲伤	0.901	0.947	
正面情绪	8.172	$Y_7$ 高兴	0.888	0.876	85.889
		$Y_9$ 爱	0.864	0.843	
		$Y_{11}$ 愉快	0.843	0.833	
		$Y_{13}$ 快乐	0.930	0.960	

度越高,则与本地居民之间的相互排斥才会进一步减小; $X_9$  涉及到再次过冬意愿,当季节性旅游移民对流入地的归属感越高,再次来此过冬的可能性则越大;总之, $X_4$ 、 $X_5$ 、 $X_6$ 、 $X_7$ 、 $X_8$ 、 $X_9$  属于身份融合维度。 $X_{10}$ 、 $X_{11}$ 、 $X_{12}$  分别代表季节性旅游移民对流入地居住环境、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心理上的感受,故该因子为心理融合维度。幸福感量表与原量表相一致,分为 3 个维度,分别为生活满意、正面情绪与负面情绪。由于  $Y_4$  “到目前为止,我得到了我在海南生活中想要的重要的事物”、 $Y_{10}$  “嫉妒”、 $Y_{12}$  “内疚”、 $Y_{15}$  “自豪”的因子负荷低于 0.5,予以删除。生活满意反映季节性旅游移民在流入地的生活质量,正面情绪维度则反映他们近一周出现高兴、愉快、快乐、爱等 4 种正面情绪出现的频率,负面情绪亦然。

### 1.3 模型构建

目前有关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和幸福感关系的研究成果较多。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过程中多重压力会减弱其幸福感,包括文化适应压力、语言障碍、交流障碍、经济问题、失业、社会边缘化、社会家庭支持的缺失等<sup>[32,33]</sup>。相反,积极的文化融合有利于提高移民的生活满意度<sup>[34]</sup>。社会融合中的文化融合维度中的语言能力、社会适应维度中的政府保障和心理健康直接作用于流动老人的幸福感<sup>[35]</sup>,也有研究发现本地交往程度、融入城市意愿等社会融合因素对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也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sup>[36]</sup>,许世存等和季永宝等分别发现城市适应和社会融合的各个维度均会对主观幸福感产生显著积极影响<sup>[37,38]</sup>。这些为季节性旅游移民社会融合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季节性旅游移民高度的流动性体现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不断追求,在流入地社会融合的过程也是其主观幸福感不断上升的过程。结合因子分析结果,本文构建季节性旅游移民社会融合与其主观幸福感之间的概念模型(图 1),尝试探索社会融合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提出以下假设:

**H1:** 季节性旅游移民文化融合对主观幸福感产生显著影响。

**H1a:** 季节性旅游移民的文化融合对生活满意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H1b:** 季节性旅游移民的文化融合对负面情绪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

**H1c:** 季节性旅游移民的文化融合对正面情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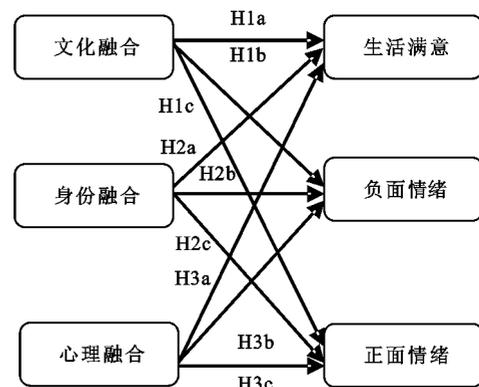


图 1 概念模型

Fig.1 The conceptual model of the study

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H2:** 季节性旅游移民身份融合对主观幸福感产生显著影响。

**H2a:** 季节性旅游移民的身份融合对生活满意产生显著的正面影响。

**H2b:** 季节性旅游移民的身份融合对负面情绪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

**H2c:** 季节性旅游移民的身份融合对正面情绪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H3:** 季节性旅游移民心理融合对主观幸福感产生显著影响。

**H3a:** 季节性旅游移民的心理融合对生活满意产生显著的正面影响。

**H3b:** 季节性旅游移民的心理融合对负面情绪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

**H3c:** 季节性旅游移民的心理融合对正面情绪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 2 数据分析与结果

### 2.1 信度效度分析

为了检验测量模型的信度与效度,首先利用 AMOS21.0 软件运用极大似然法对所有实际保留在最终测量模型中的测量条目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并运用 SPSS21.0 对测量指标进行信度分析,结果显示,各个维度的 Cronbach's Alpha 系数均大于 0.8,符合大于 0.8 的标准,说明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量表的效度则是通过收敛效度和判别效度来进行判别。收敛效度是指测量同一潜在变量的不同观测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由表 2 可知,所有项目的标准化因子载荷均大于 0.5 的标准,且都在

$P < 0.001$  的水平上显著,所有维度平均变异抽取量均在 0.623~0.886 之间,大于 0.5 的标准,组合信度均在 0.832~0.958 之间,大于 0.700 的标准,表明样本具有良好的收敛效度。判别效度是指各维度之间的可区分性,各维度平均变异抽取量的平方根均大于该维度与其他维度之间的相关系数,表明各维度之间判别效度良好。

表 2 验证性因子分析

Table 2 The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因子	测量题项	标准化因子负荷	平均变异抽取量	组合信度	Cronbach's $\alpha$
文化融合	$X_1$	0.845	0.794	0.920	0.919
	$X_2$	0.910			
	$X_3$	0.916			
身份融合	$X_4$	0.590	0.661	0.884	0.878
	$X_7$	0.825			
	$X_8$	0.919			
	$X_9$	0.879			
心理融合	$X_{10}$	0.872	0.681	0.865	0.864
	$X_{11}$	0.814			
	$X_{12}$	0.787			
生活满意	$Y_1$	0.777	0.623	0.832	0.832
	$Y_2$	0.795			
	$Y_3$	0.796			
负面情绪	$Y_6$	0.898	0.886	0.959	0.958
	$Y_8$	0.950			
	$Y_{14}$	0.974			
正面情绪	$Y_7$	0.886	0.783	0.915	0.914
	$Y_9$	0.844			
	$Y_{11}$	0.923			

注:所有测项的标准化因子载荷均在  $P < 0.001$  水平上显著。

## 2.2 结构方程模型检验与结果分析

### 2.2.1 结构模型拟合度检验及模型修正

本文选取  $\chi^2/df$ , GFI, AGFI, IFI, TLI, CFI,

RMSEA 等指标衡量结构模型的拟合度。运用 AMOS21.0 利用极大似然法对概念模型进行结构方程模型检验后发现,假设模型与整体数据之间的适配只达到可接受水平,尚未达到优良的拟合水平,因此需要通过模型修正来提高整体适配度。模型修正主要依据以下 2 个原则,一是 AMOS 软件中提供的修改指数对于识别并清理不良测量条目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对导致测量拟合指标不达标不良测量条目进行删除,直到达到所有结构方程的拟合标准<sup>[39]</sup>,二是当模型界定没有错误时,不适当解值是由指标变量多元共线性问题造成的,模型重新界定的较佳方法为将造成多元共线性问题的指标变量移除<sup>[40]</sup>。删除  $X_5$ “我与当地人的交往比较广泛”、 $X_6$ “我愿意把自己当做新海南人”、 $Y_3$ “在三亚期间,我对我的生活感到满意”、 $Y_{13}$ “快乐”4 个指标后,修正前后拟合指标的对比情况如表 3 所示,除了 AGFI 约接近于 0.9 以外,其他指标都达到理想值,说明修正后的模型拟合效果较好。

### 2.2.2 假设检验结果分析

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可知,文化融合对生活满意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 0.006,显著性水平  $P > 0.05$ ,表明文化融合对生活满意产生了不显著的正面作用,与假设 H1a 不符;文化融合对负面情绪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 0.062 ( $P > 0.05$ ),表明文化融合对负面情绪产生了不显著的抑制作用,与假设 H1b 不符;文化融合对正面情绪影响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 0.117,显著性水平  $P < 0.05$ ,表明文化融合对正面情绪具有显著性影响,假设 H1c 得到验证。身份融合对生活满意、正面情绪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 0.353 ( $P < 0.001$ )和 0.316 ( $P < 0.001$ ),表明身份融合对生活满意和正面情绪均产生显著的正向作用,假设 H2a、H2c 得到验证;身份融合对负面情绪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 0.351 ( $P < 0.001$ ),表明身份融合对负面情绪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假

表 3 结构方程模型拟合度检验

Table 3 The fitting test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评价指标	$\chi^2/df$	GFI	AGFI	IFI	TLI	CFI	RMSEA
修正前	3.799	0.830	0.784	0.912	0.897	0.911	0.094
理想标准值	3	>0.90	>0.90	>0.90	>0.90	>0.90	<0.08
修正后	2.118	0.912	0.880	0.966	0.958	0.965	0.059

设 H2b 得到验证。心理融合对生活满意和正面情绪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 0.492( $P < 0.001$ )、0.390( $P < 0.001$ ), 表明心理融合对生活满意和正面情绪亦均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 假设 H2a、H2c 得到验证; 对负面情绪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 0.469( $P < 0.001$ ), 表明心理融合对负面情绪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 假设 H2b 得到验证。

综上, 季节性旅游移民的文化融合对主观幸福感的积极作用有限, 仅对正面情绪这一维度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对负面情绪与生活满意的影响均很小且不显著。三亚作为典型的滨海旅居城市, 为多种文化的共生共存提供了开放包容的社会氛围。与此同时, 在每年的 10 月到次年的 4 月, 三亚人数众多的季节性旅游移民群体文化背景的相似性, 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他们对迁入地的陌生感。与其他流动人群相比, 其所面临的习俗、语言、饮食习惯等方面的挑战更小。季节性旅游移民是否熟悉当地方言和风俗, 是否适应当地饮食, 不影响其在流入地的生活质量。因此文化融合对季节性旅游移民主观幸福感的作用相对较小。

季节性旅游移民的身份融合对生活满意和正面情绪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亦会显著地抑制负面情绪的产生。传统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相比一般处于相对弱势地位, 但与本地居民相比, 季节性旅游移民在心理资本和经济资本上具有一定的优越感。他们在与本地居民相互交往中, 无法保持平等对话的心态更易产生纠纷。由于缺乏身份认同, 使得两者的社会交往均趋于同质化和内卷化, 进一步强化了彼此的身份边界。更多的矛盾意味着更多的不满, 因此身份融合程度越低, 季节性旅游移民的主观幸福感也就越低。

与文化融合和身份融合相比而言, 季节性旅游移民心理融合更能提升季节性旅游移民的主观幸福感。具体表现在心理融合能够显著地促进正面情绪的产生, 并且能够显著地减少愤怒、忧虑、悲伤等负面情绪, 与此同时也会对生活满意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本文心理融合的测项为季节性旅游移民对社会、住房以及自然环境的主观评价, 该主观评价不仅与被访者所感受到的实际情况有关, 也与季节性旅游移民与本地居民之间的横向比较以及流动前后的生活状况的纵向比较有关。与当地入相比季节性旅游移民消费能力更强, 与流出地的气象气候和自然环境相比, 三亚优良

的自然环境和温暖的气候为季节性旅游移民提供了更优越的生活条件。而由此所产生的对三亚社会、住房及自然环境等的满意感正是主观幸福感的重要表征。

### 3 结论和讨论

本文开发了季节性旅游移民社会融合测量表, 通过信度与效度进行检验说明量表开发的科学性与可用性, 并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季节性旅游移民在流入地的社会融合由文化融合、身份融合和心理融合构成。本文所构建的季节性旅游移民社会融合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模型, 有效地反映出他们在移民地的融合程度与生活状况。具体结果为: 季节性旅游移民的文化融合对主观幸福感的作用较小, 仅对主观幸福感的正面情绪维度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而季节性旅游移民的心理融合和身份融合均会对主观幸福感的正面情绪、负面情绪、生活满意等 3 个维度产生显著影响。

值得探讨的是, 季节性旅游移民心理融合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效应最大, 身份融合次之, 文化融合最小。一方面反映出作为旅居地的三亚为季节性旅游移民创造较为优越的生活空间, 满足季节性旅游移民在心理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使其在三亚的主观幸福感大大提升。另一方面, 三亚作为一个旅游城市所具有的多元化和包容性, 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文化融合对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作用。同时, 与本地居民之间明显的身份边界所造成的冲突与误会, 则显著地减弱了季节性旅游移民的幸福感。可见, 与传统的流动人口不同, 季节性旅游移民拥有更强的经济背景和更高的环境适应能力, 文化融合在其社会融合过程中不起决定性作用, 他们可以有选择地在某些方面融合到流入地主流社会。这与社会融合代表性理论之一的“区隔融合论”的核心思想相一致。

研究的政策涵义主要有 3 个方面。提升文化融合: 应弘扬当地文化, 并加强对当地人的文化素质教育, 丰富三亚的人文内涵, 从而增进季节性旅游移民对当地人文环境的认同感, 进一步提高其主观幸福感; 提升身份融合: 应充分运用社会媒体的宣传作用和社区组织的协同作用, 有效化解季节性旅游移民和当地居民的心理隔阂和矛盾, 从而提升季节性旅游移民主观幸福感; 提升心理融

合:应加强发挥政府职能部门的主导作用,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保护生态环境,有效控制物价,加快建设休闲空间等,全面优化季节性旅游移民的生活环境,从而提升季节性旅游移民主观幸福感。

本文主要揭示了季节性旅游移民社会融合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和局限性,一是受案例地选择的限制,所开发的量表和所构建的模型还有待在更多的案例地进行验证。二是本文共时性地考察季节性旅游移民社会融合与其幸福感的产生,以后的研究中可以从时间序列的角度,综合考虑移民的居住时长及过冬次数,探讨季节性旅游移民社会融合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动态过程。

###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海南省统计局. 海南统计年鉴(2016—2019)[M].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6-2019. [Statistics Bureau of Hainan Province. Hainan Statistical Yearbook(2016-2019). Beijing: China Statistics Press, 2016-2019.]
- [2] Adamiak C, Pitkänen K, Lehtonen O. Seasonal residence and counter urbanization: The role of second homes in population redistribution in Finland[J]. *GeoJournal*, 2017, 82(5): 1035-1050.
- [3] Stone I, Stubbs C. Enterprising expatriates: lifestyle migr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rural Southern Europe[J]. *Entrepreneurship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2007, 19(5): 433-450.
- [4] Baum T, Hearn N, Devine F. Place branding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people at work: Exploring issues of tourism imagery and migrant labour in the Republic of Ireland[J]. *Place Branding & Public Diplomacy*, 2008, 4(1): 45-60.
- [5] Casado-Díaz M A, Casado-Díaz A B, Casado-Díaz J M. Linking tourism, retirement migration and social capital[J]. *Tourism Geographies*, 2014, 16(1): 124-140.
- [6] 吴悦芳, 徐红罡. 基于流动性视角的第二居所旅游研究综述[J]. *地理科学进展*, 2012, 31(6): 799-807. [Wu Yuefang, Xu Honggang. A literature review of second residence tourism: Implication on mobility analysis.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2, 31(6): 799-807.]
- [7] Smith S K, House M. Snowbirds, sunbirds, and stayers: Seasonal migration of elderly adults in Florida[J]. *The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B: Psychological Scienc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06, 61(5): 232-239.
- [8] 马少吟, 徐红罡. 从消费到生产:大理古城生活方式型旅游企业主移民的生存特征[J]. *旅游学刊*, 2016, 31(5): 81-88. [Ma Shaoyin, Xu Honggang. From consumption to production: Understanding the tourism lifestyle entrepreneur in Dali. *Tourism Tribune*, 2016, 31(5): 81-88.]
- [9] 姜辽, 李甜甜. 周庄古镇旅游劳工移民的存在主义分析[J]. *旅游科学*, 2016, 30(2): 15-23. [Jiang Liao, Li Tiantian. Existential analysis of tourism labor migration in ancient town Zhouzhuang. *Tourism Science*, 2016, 30(2): 15-23.]
- [10] 李雨潼, 曾毅. “候鸟式”异地养老人口生活现状研究——以海南省调查为例[J]. *人口学刊*, 2018, 40(1): 56-65. [Li Yutong, Zeng Yi. Study on living situation of “seasonal migratory retirees” based on survey in Hainan province. *Population Journal*, 2018, 40(1): 56-65.]
- [11] 韦晓丹, 陆杰华. 季节性候鸟老人自评健康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以海南省为例[J]. *北京社会科学*, 2017(5): 99-107. [Wei Xiaodan, Lu Jiehua. An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n the self-rated health of seasonal migratory aged people: A case study of Hainan. *Social Sciences of Beijing*, 2017(5): 99-107.]
- [12] Jun H J, Ha S K. Social capital and assimil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and foreign wives in South Korea: The case of Wongok community[J]. *Habitat International*, 2015, 47: 126-135.
- [13] Campos W, Martinez A, Sanchez W et al. A systematic review of proposals for the social integration of elderly people using ambient intelligence and social networking sites[J]. *Cognitive Computation*, 2016, 8(3): 529-542.
- [14] Marsh K, Dieckmann S. Contributions of playground singing games to the social inclusion of refugee and newly arrived immigrant children in Australia[J]. *Education 3-13*, 2017, 45(6): 710-719.
- [15] Wang Z, Zhang F, Wu F. Intergroup neighbouring in urban China: Implications for the social integration of migrants[J]. *Urban Studies*, 2016, 53(4): 651-668.
- [16] Quilgars D, Pleace N. Housing first and social integration: A realistic aim[J]. *Social Inclusion*, 2016, 4(4): 5-15.
- [17] Lättman K, Friman M, Olsson L E. Perceived accessibility of public transport as a potential indicator of social inclusion[J]. *Social Inclusion*, 2016, 4(3): 36-45.
- [18] 薛艳. 基于分层线性模型的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影响因素研究[J]. *人口与经济*, 2016(3): 62-72. [Xue Yan. A research on the factors affecting social integration of floating population based on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 *Population & Economics*, 2016(3): 62-72.]
- [19] 周皓. 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测量及理论思考[J]. *人口研究*, 2012, 36(3): 27-37. [Zhou Hao. Measurement and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of immigrant assimilation in China. *Population Research*, 2012, 36(3): 27-37.]
- [20] Diener E, Eunkook M S, Richard E et al. Subjective well-being: Three decades of progress[J]. *Psychology Bulletin*, 1999, 125(2): 276-294.
- [21] Chen Y, Feeley T H. Social support, social strain, loneliness, and well-being among older adults[J]. *Journal of Social & Personal Relationships*, 2014, 31(2): 141-161.
- [22] Dolan P, Peasgood T, White M. Do we really know what makes us happy? A review of the economic literature on the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subjective well-being[J]. *Journal of Economic*

- Psychology, 2008, 29(1): 94-122.
- [23] Steptoe A, Deaton A, Stone A A. Subjective wellbeing, health, and ageing[J]. *The Lancet*, 2015, 385(9968): 640.
- [24] MacKerron G, Mourato S. Happiness is greater in natural environments[J].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2013, 23(5): 992-1000.
- [25] Sekulova F, van den Bergh J C J M. Climate change, income and happiness: An empirical study for Barcelona[J].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2013, 23(6): 1467-1475.
- [26] 李梦洁. 环境污染、政府规制与居民幸福感——基于CGSS(2008)微观调查数据的经验分析[J]. *当代经济科学*, 2015, 37(5): 59-68+126. [Li Mengji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governmental regulation and the happiness sense of residents: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CGSS(2008) micro-survey data. *Modern Economic Science*, 2015, 37(5): 59-68+126.]
- [27] 刘庆, 冯兰. 流动儿童社会融合的结构、现状与影响因素[J].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 2014, 33(6): 55-60. [Liu Qing, Feng Lan. The structure, current situa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ocial integration of migrant children. *Journal of China Youth University for Political Sciences*, 2014, 33(6): 55-60.]
- [28] 周红云, 胡浩钰. 社会支持对流动老人社会融合的影响——基于武汉和深圳的调查数据[J]. *西北人口*, 2017, 38(4): 24-32. [Zhou Hongyun, Hu Haojue. Influence of social support on social integration of elderly migrants: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in Wuhan and Shenzhen. *Northwest Population Journal*, 2017, 38(4): 24-32.]
- [29] 张文宏, 雷开春. 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的结构、现状与影响因素分析[J]. *社会学研究*, 2008(5): 117-141+244-245. [Zhang Wenhong, Lei Kaichun. The urban new immigrants' social inclusion internal structure, present situation and influential factors. *Sociological Studies*, 2008(5): 117-141+244-245.]
- [30] 俞林伟, 朱宇. 社会融合视角下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度及其代际差异——基于2014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分析[J]. *浙江社会科学*, 2017(10): 75-85+158. [Yu Linwei, Zhu Yu. Life satisfaction and 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of migra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integration theory. *Zhejiang Social Sciences*, 2017(10): 75-85+158.]
- [31] 苗元江. 心理学视野中的幸福——幸福感理论与测评研究[D].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 2003. [Miao Yuanjiang. Happiness in Psychology Filed: Research into the Theory and Measurement of Well-being. Nanjing: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2003.]
- [32] Berry J W. Immigration, acculturation, and adaptation[J]. *Applied Psychology*, 1997, 46(1): 5-34.
- [33] Amit K, Litwin H.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immigrants aged 50 and older in Israel[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10, 98(1): 89-104.
- [34] Angelini V, Casi L, Corazzini L. Life satisfaction of immigrants: does cultural assimilation matter?[J].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2015, 28(3): 817-844.
- [35] 王业斌, 韦尚玉, 李晓叶, 等. 社会融合对流动老人幸福感的影响——基于CGSS数据的实证研究[J]. *广西财经学院学报*, 2018, 31(3): 102-115. [Wang Yebin, Wei Shangyu, Li Xiaoye et al.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integration on the happiness of floating old people: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CGSS data. *Journal of Gu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018, 31(3): 102-115.]
- [36] 戴宏伟, 回莹. 京津冀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实证研究[J]. *社会科学战线*, 2016(4): 164-171. [Dai Hongwei, Hui Ying. Empirical study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floating population in Beijing, Tianjin and Hebei. *Social Science Front*, 2016(4): 164-171.]
- [37] 许世存. 城市适应对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分析——以黑龙江省为例[J]. *人口学刊*, 2015, 37(4): 36-47. [Xu Shicun. An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of urban adaptability on floating population's subjective well-being: A case study of Heilongjiang Province. *Population Journal*, 2015, 37(4): 36-47.]
- [38] 季永宝, 高敬云, 杨俊. 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程度对其幸福感的影响——以山东省为例[J]. *城市问题*, 2016(7): 95-103. [Ji Yongbao, Gao Jingyun, Yang Jun. The influence of the social integration degree of floating population on its happiness: A case study of Shandong Province. *Urban Problems*, 2016(7): 95-103.]
- [39] 宋子斌. 基于游客感知构建旅游目的地形象的测量模型——以海南省为例[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6: 61-63 [Song Zibin. The measurement model of tourism destination image based on tourists' perception: A case study of Hainan Province. Beijing: Science Press, 2016: 61-63]
- [40] 吴明隆. 结构方程模型AMOS: 实务进阶[M].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3: 38-39. [Wu Minglo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Tips for practical application. Chongqing: Chongqing University Press, 2013: 38-39.]

## Social Integration on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Seasonal Tourism Immigrants in Sanya

Zhao Chen<sup>1,2</sup>, Chen Yangle<sup>1</sup>, Zhang Kai<sup>1</sup>, Shen Wencan<sup>3</sup>

(1. School of Tourism, Hainan University, Haikou 570228, Hainan, China; 2. Institut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Anqing Normal University, Anqing 246133, Anhui, China; 3. School of Tourism,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4, Sichuan, China)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theory of Mobility has become a popular research topic in tourism, but there are rarely researches on tourism consumption immigrants among local scholars. This article takes the representative group of tourism consumption immigrants, which is the seasonal tourism immigrant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constructs the conceptual model of the influence of the social integration of seasonal tourism immigrants on subjective happiness, and proposes relevant hypotheses; Sanya is taken as the case, and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is used to verify the hypothesis. The results are shown as follows: 1) The social integration of seasonal tourism immigrants consists of cultural integration, identity integration and psychological integration. This article developed the scale of social integration of seasonal tourism immigrants and tested its dimensions,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through exploratory and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2) The cultural integration of seasonal tourism immigrants has the least impact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has only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positive emotion; while psychological integration and identity integration are positively used for life satisfaction and positive emotion, and have a significant inhibitory effect on negative emotion. 3) Sanya has created a superior living space for seasonal tourism immigrants, which not only satisfies the needs of happy life of seasonal tourism immigrants, but also greatly enhances the subjective happiness of them. In addition, the diversity and inclusiveness of Sanya as a tourist city can eliminate the role of cultural integration in promoting subjective happiness. However, conflicts and misunderstandings caused by obvious identity boundaries have greatly reduced the happiness of seasonal tourism immigrants. Therefore,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to improve the identity integration of the seasonal tourism immigrants. Finally, based on empirical analysis, the promotion strategy of subjective happiness of the seasonal tourism immigrants is proposed from the aspects of cultural integration, identity integration and psychological integration.

**Key words:** seasonal tourism immigrants; social integration; subjective well-being; Sanya in Hainan Province